

# 卜辭時代的文學和卜辭文學

唐 蘭

國立清華大學  
清華學報單行本  
(民國廿五年七月)

可

MG  
I206.2  
84

## 卜辭時代的文學和卜辭文學

唐 蘭

- 一 卜辭時代的社會和文化
- 二 卜辭時代的一般文學
  - 甲 商代有沒有文學的問題
  - 乙 商代文學和文學的起源
- 三 銘識的起源和卜辭時代的銘識
- 四 卜辭文學
  - 甲 卜辭的起源
  - 乙 卜辭的組成
  - 丙 卜辭文學的研究
- 五 結論

### 一 卜辭時代的社會和文化

研究卜辭當然得先知道那時代的社會和文化,但是學者間能留意到這一方面的,還不很多。

郭沫若氏在民國十八年所著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裏曾有過一篇卜辭中的古代社會,裏面包含了兩個子目:(一)社會基礎的生產狀況,(二)上層建築的社會組織;這是做這種研究的第一聲。郭氏書裏所提到的問題的結論,由現在看來,很多錯誤。但因類此的研究太少的緣故,一般人總不免受到那篇文章裏的影響。

郭氏書中最大的錯誤,是關於社會組織方面。照他的意見,商代還是用“亞血族羣婚制”,是兄弟姊妹羣婚的時代;換一



3 2285 1243 4

方面說，就是商代還是野蠻時代。這一個結論，深入於現代一般人的心目，因而對商代社會文化，常發生誤解。其實“巫血族羣婚制”即是莫爾剛（Morgon）所謂“彭那魯安家族”（Punaluan Family）。照莫氏的解釋，這種制度，發生於“野蠻狀態”下面，（漢譯本古代社會下冊二八八頁）但一直到“文明狀態”，才發明了聲音字母，開始書寫文字，（同上上冊一六頁）而從“野蠻狀態”到“文明狀態”的中間，還有一個“未開化狀態”的時代。卜辭時代是有文字的，而且有很多的聲符文字，那時早已遠離了“野蠻狀態”和“未開化狀態”，是毫無疑問的。在這種狀態下，那能還是“巫血族羣婚”呢？

郭氏所以發此說，實在給一種稱謂欺騙了。卜辭裏有“三父”，“多父”一類的話，驟看去很可奇怪，其實這和後來的諸父有什麼分別呢？有許多地方，凡異姓的年老而可尊敬的，常稱為“父”，這難道也是雜婚制嗎？有許多名稱的含混，或者是野蠻時代的遺習，但我們不能就這一點來斷定那時代的文化。

卜辭裏面，示壬的妣是妣庚，示癸的妣是妣甲，從湯以下，直系之祖各有各的妣，這豈是羣婚時代所有的現象。但像配祖丁的有妣己，妣庚，妣癸，和配武丁的有妣戊，妣辛，妣癸，（1）我們反可以知道那時所行的是一夫多妻制。

莫爾剛氏所稱為“父系家長家族”的制度，是屬於未開化時代的晚期的家族形態，但在文明時代的初期，也一時地保存着。（漢譯本下冊三七三葉）商代的家族形態，大致和這相近。

照郭氏在卜辭通纂（考釋七三葉）裏的說法，和他寫給作者

（1）卜辭裏的婦好，婦姁等，均武丁之妻生時之名，妣戊等乃後世追稱。

的信裏均已承認商代的父權制度。那末,他的舊說應取消,是無疑的。但一般人却還很多迷信他的舊說。有人說,春秋時齊楚等國,諸姑姊妹可婚,還沒有脫離血緣婚的範圍,何況商代。這種說法,趨舉一時的變態,來當做常態,實是一種重大的錯誤。

上面說商代已是文明時代,而遠離了未開化時代,只文字一端,已是極好的證據,卜辭時代使用的文字,早已跨入了用聲符的新途徑。照文字學的觀點,判別文字的上古期,和近古期,以有沒有聲符字為標準。那末,單就商代的文字而言,也可以窺見那時的文化了。

商代的青銅器,發現很多。李濟氏在安陽發掘報告(五七五葉)裏說到那種青銅武器的形制,多像歐洲青銅時代的第四期物品,和萊尼塞河流域出土的青銅器。這可以證明那時已是青銅器時代了。但郭沫若氏却把殷虛時代列為金石併用時代(古代社會研究二五一葉)這也是一個重大的錯誤。這個錯誤,又把商代搬出文明時代去了,和他定商代是“亞血族羣婚”是相聯的。不知金石並用時代,只是從石器到金屬器的一個極短的時期,所用多半是黃銅和黃金,和殷虛完全不合。青銅器時代以青銅器為主體,但石器也還存在,正和鐵器時代還有銅器一樣。所以,就殷虛還有石器發現的一點,不能說商代是金石併用時代。

照人類學家的說法,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已知道種植和牧畜,因而母系的社會轉而為父系社會。在那時候,已有很多石製的兵器,為後來銅器時代所仿效的。因農業的發展,人都有安定的生活,人口便繁殖起來,因而共同社會發達,促成支配權的發生,因而形成國家。金屬器時代和國家的發生是同時的,

因為堅硬的武器，增加了酋長們的勢力，王侯就因而出現了。歷史記錄的出現，大體上和國家的出現，是一致的。（參考漢譯本西村真次人類學汎論一八七——一八九頁）。

由商代的青銅器的形式和花紋，可以看出不是初期的產品；這種極高的技巧，不是人類開始仿效石器或陶器的時候所能得到的。由文獻上說，在殷虛時代（即殷商後期）以前，六——七百年，夏后啟的時代，有一個昆吾的民族，已經開始鑄鼎了。而銅兵的起源，還在其前。

雖則有些學者，盡量把中國文化縮短，以為商周以後，才是有史時期。但由夏中葉以後，有王的詳細世系，有每個王的在位年數，有各樣紀事，曾載在紀年，世本，和史記裏面，是不容抹殺的。卜辭所見商代的先公，從王亥到示癸，正當夏的後期，和史記所說差不多，可見這種記載是可信的。歷史和傳說的分界，大概在夏后啟的時候，所以夏后啟和有窮后羿，一方面是古代神話的後鎮，一方面却是歷史記載的前驅。

關於夏后啟以前的傳說，在戰國以後，固然真贋錯雜，但在戰國中期以前的記載，像山海經，左傳，國語，紀年，天問等書，却頗一致。這種傳說裏最早的時代，有太昊，少昊，炎帝和黃帝，炎黃的戰爭，和黃帝，蚩尤的戰爭，是中國最早的戰爭。而銅兵的起源，也在這個時候。由黃帝而帝顓頊，帝嚳，帝鴻，帝堯，帝丹朱，帝舜，就到了夏后禹，夏后啟，這一個在歷史記錄前的傳說的時期，大概有兩三百年。

當銅兵發生以後，黃帝的一個民族，得到了勝利而組成了國家，這是兩昊諸帝時代。隔了兩三百年，變成堯後時代，不久，就演成世襲的王朝，國家的構成，更堅固了。同時，就有別的銅

器的出現，也有歷史記錄的發現。那麼，這種傳說和事實的距離，大概不十分遠。

卜辭時代以前，已經有了六——七百年的歷史，是無疑的。單就商民族而論，從王亥，上甲以下，也有四——五百年的歷史了。國家的形成，據傳說是在黃帝時代，到此時總有一千年的左右了。那麼，那時代的社會組織的進化，和一切文化的進步，是可以想見的。

在卜辭裏面，王的同族是王族，王以外的貴族有公侯伯，以至於亞；政府裏面有尹，宰，甸，工，卿，事，太史，大，又，小臣，繅，臣，巫，祝之類；供驅使的有奚和役，——即奴隸；大體上都和周初的情形差不多。王后雖稱為婦，但婦人稱姓，像婦好（即子姓）婦嬀（即井姓）之類，也和周世無異。(2)

在商代的產業方面，郭沫若氏以為“是由牧畜進展到農業的時期”，（古代社會研究二五四頁）或“以農藝牧畜為主”（卜辭通纂考釋一〇三葉）也都是錯誤的。卜辭說到牧畜的極少，郭氏因用牲之數有到三百四百，就以爲是牧畜最蕃盛的時代。其實後來秦德公祀畎時用三百牢，左傳“吳人徵百牢”，可見用牲的多，不足證明那時畜牧是“主要產業”。郭氏又說：

其所以早爲制牧貞卜者，蓋包含於祈年之例中也。

詩小雅無羊乃考牧之詩，末章云：“大人占之，衆惟魚矣，實爲豐年”，是知古之祈年，不限於稼穡矣。——卜辭通纂考釋一〇〇頁。

但年字作𠂔，本從禾字演變，所以卜辭裏的“受年”就是“受禾”，“華年”就是“華禾”，本只有農業的意味。卜辭裏的“受年”，又分

(2)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說殷時女子不以姓稱，甚誤。

析做“受黍年”，和“受稷年”，<sup>(3)</sup>也和畜牧無關。

農業的重視，在卜辭裏是很明顯的，除了普通的“受年”“率年”外，有專指那一個地方受年的，例如：“甲辰卜，商受年”；（前編三，三〇，六片）也有泛指各方受年的，像：北方受禾，西方受禾之類。此外有“觀藉”的禮，有“告麥”的禮，而且管藉事的還有“藉臣”。可見只有農業才是商代的主要產業。

我以為牧畜在新石器時代，確是主要產業，但初期的畜牧者，過的還是流浪生活，一直到農業發達，才能有定居的生活。<sup>(4)</sup>農業發達以後，人有定居，才能有村落，有國家，而牧畜也就退居次要了。商代已有大都會，像大邑和歸，而王所居有宮，寗，宗，室，試問住在這種都會和宮室裏的民族，還能把牧畜做主要產業嗎？所以，商代只是農業發達的時期，和周代略同，牧畜已是農業的副產物了。祭祀用牲的多，只是特殊階級特意去豢養的。

商人工藝的進步，盡人所知，現在不必特別詳細去記述。傳世的器物，取材的廣泛，品類的衆多，式樣的新異，刻鏤的精美，在殷虛古器物圖錄，鄴中片羽，殷文存，續殷文存等書裏，可以得到一個概略。中央研究院所發掘出來的物品，尤可以供我們去研討。總之，這些東西，完全和青銅器時代相應而不是一個野蠻時代。

從工業品方面，我們已能知道商代藝術的優美。在那時已用筆墨，書法已頗講求，有好些作風。商畫雖無傳，但在卜辭

(3) 稷字舊釋為齊，詳見拙著殷虛文字記。

(4) 後來有許多地名，像卜辭裏所見的“亳”牧”却還是畜牧時代遺留下來的痕跡。

裏有些文字，幾和圖畫一樣。音樂方面，現所知道的有簫，鼓，磬，鐃等樂器，和濩舞。

宗教方面，商人也很崇拜自然神，像上帝，土，河，岳(5)之類。尤其重視的是人鬼，祭祀的繁多，貞卜的頻數，都是“商人尚鬼”的明徵。商人相信一切災咎，有鬼神作祟，因而有通鬼神的巫祝和問吉凶的卜筮。但有些並不是商人創始的，春秋時有夏祝和商祝，可知祝是從夏世已有的。

關於歷數，商人大概只是承襲前世的，從夏世起已有紀年，和春秋時還存有“夏時”，都可以證明。雖則卜辭的記載，有時錯誤，例如一個月裏有了四次卜旬，或因失了一閏而有十四月之類，但像後一種錯誤，就是春秋時還會發生的。(6)

有一個末節，可以特別注意的，商代對本族的人鬼，像祖，妣，父，母，和兄，往往用十干為稱號，(7)這是很有趣的問題。前人把這種當做商代的人名，而為什麼有這名，却有兩種說法。史記殷本紀索隱說：

皇甫謐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蓋自微始。譙周以為死稱廟主曰甲也。皇甫謐以為用生日為名，這是一說，而最近董作賓氏却主張死日為名，(甲骨文斷代研究例)這又是一說。

用生日為名的一說最錯誤，因為王亥，王恆的亥和恆，上甲的微，天乙的湯，才是真正的名，而十日決不是生時稱的；卜辭裏

(5) 河字依郭沫若說，他以為是人名，却錯了。岳字即嶽，依孫詒讓說。卜辭河，岳，年和饗同祭。

(6) 孫海波氏以十三月為正月，十四月為二月，非是。

(7) 羅振玉氏等以為人名有用十二支者，其實皆誤。



的婦妣，婦妣，決不稱甲乙，但稱為母或妣的時候，便用甲乙了，更可以證明甲乙是死後若干時才稱的。用死日為稱的一說也不對。紂死於甲子，為什麼做叫辛呢？

我以為上文所引譙周的說法，死稱廟主，實比這兩說為優。這種稱號，是和祭禮有關的。用甲日祭就叫做甲，用乙日祭就叫做乙。在銅器裏面，常看見祖日乙，祖日庚一類的名稱，而史喜鼎說：“史喜作朕文考翟祭，辛日唯乙”，更是一個確證。王國維氏說：

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辭之通例也。

這是一般學者所公認的，但事實上却是看倒了。

在夏的世系裏，太康，仲康，少康，似乎就是大庚，中庚，小庚。夏帝用十干做稱號，大都已遺漏，只有帝廑又叫做胤甲，他的兒子叫做胤孔甲，隔了兩代，又有一個履癸，即是桀。在商民族方面，當夏的時候也有了上甲，報乙，報丙，報丁，主壬，主癸，和妣庚，妣甲。這種相同，實在不是偶然的。在這一點上，至少可以說商代的文化，有些是起源於夏世的。

在商代所用的禮文裏，郭沫若已經說過“多已與周人同，孔子所謂周因於殷禮者也”的話。（卜辭通纂攷釋一〇三頁）但這種文化是商時突然產生的嗎？我們根據上面的推論，便還得補充一下。商代文化，在中國古史裏已到了很興盛的時期，因為牠是從夏文化演進的，孔子所謂“殷因於夏禮”者也。

## 二 卜辭時代的一般文學

### 甲 商代有沒有文學的問題

現代的文學史家，所最感到困難的，無過於中國的古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的資料，本就不多。加之這幾年來，受了疑古運動的影響，大部份都被上了可疑的色彩，於是材料就更缺乏了。

就商代來說吧。商代的文學，本來有商書可以做代表，<sup>(8)</sup>但一般的文學史家大都不敢接觸到這個問題。這裏有兩層原因：第一，在疑古風氣極盛的時候，學者們總抱着“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的念頭，有人說盤庚是真，有人說盤庚是假，在沒有定論以前，只好不提。第二，由文學史的看法，韻文是應該先於散文的，但一般所公認的最早韻文，只有詩經，而詩經只有周人作品，如其說有早於周詩的商書，就變做散文先於韻文，所以也只好不提。

除了商書以外，還有彝銘和卜辭無疑地是商人的作品了，但因記載這種銘辭的文字，非專家不能研究而專家的研究也還沒有完密，因而文學史家不能做較深遠的探討。

所以，周以前的文學，在中國文學史裏幾乎是一張白紙，在白紙裏，却充滿了很多待決的問題。

有些研究者，沒有注意到這些問題，以爲只有詩經是中國最古的文學，於是，商代便被判決爲沒有文學或文學剛在萌芽的時代了。照他們的說法，商書是後人所作，卜辭和彝銘，才是商人做的那樣簡短而素樸的體格，只是文學起源時代的東西，在疑古風氣極盛的時期，一切中國古代文化總得移後幾百年，文學又豈能例外，所以，這種說法，是容易博得一部分羣衆的信仰的。

但是，商代有沒有文學，不是這樣輕率的說法所能解決的。

(8) 商書是後人仿作。

文學不是一個孤立的東西，在上一章裏，我已經指出商代一般文化的絢爛，在這種文明社會裏，難道不能作一個較長的演說，或談話（像盤庚或微子裏所記的）嗎？商代的文字，見於卜辭和彝銘，雖不過三千字左右，但在當時，至少總得有一兩萬。<sup>(9)</sup>有這麼多的文字，難道不能寫一篇比較長的文章嗎？

我在頤齋吉金圖錄的序裏，曾指出卜辭彝銘所以多簡短而質樸，只是實用的關係，而尋常長篇文字，是應該寫在竹帛上的。不幸竹帛的保存不易，所以，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只是些短篇。在殷契佚存的序裏，我又曾指出古代在竹帛以前，大概還用過玉石，雖則我們現在只發見了卜辭彝銘，而沒有發見商以前別的材料，但不能斷然說商代沒有長篇的文字。同時，郭沫若氏所發表的周代彝銘進化觀和我的意見，幾乎完全一致。

郭氏文裏引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來證明殷時就有竹簡，是有充分理由的。<sup>(10)</sup>多士是現代學者所公認的周初作品。“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意思是說：你們殷人的祖先，有典籍流傳下來，說殷的代夏而有天下，是革夏的命。（易傳說：“湯武革命”，就本於此文）。這段話見於周初的記載，出乎成王的口，是何等強有力的證據。周初書裏常常說到夏商的史事，當然都是根據這種典冊的記載。那末，商代已有很完備的記載，是無可疑的。

只要稍具一些進化觀念的人，一定相信周初許多長篇文章，尤其是只有一個論點而講了七百來字的無逸，決不會突然地產生的。整整齊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周易繇辭，也

(9) 于省吾氏續殷文存序與余意見正同。

(10) 董作賓氏謂典冊皆龜甲，甚誤，余別有文論之。

不是文學剛在萌芽時代所能有的。如上面所說，商代有很高的文化，很多的文字，和很完備的記載，那末，一定也有很優美的文學。周初的文學家，受過商代文學的影響，是無疑的。

卜辭辭銘的素樸和簡短，不够做商代沒有文學的證據。春秋的記事，何嘗不素樸簡短，戰國時的銅器銘辭，何嘗不是一兩個字，——最多不過十數字，我們能說春秋戰國時期還沒有文學嗎？

#### 乙 商代文學和文學的起源

商代是應當有文學的，那末，商代的文學是些什麼呢？

前面我說過，商代文學是可以拿商書來做代表的，現在讓我們把商書的內容，檢討一下。尚書裏所收的商書，據舊說有四十篇，現在把書序抄下來，如下：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荒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湯歸自夏，至于大，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伊尹作咸有一德”。

“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盤庚五遷,將治亳,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這四十篇的商書,今文尚書裏只剩了七篇,五個題目,一湯誓;二,盤庚三篇;三,高宗彤日;四,西伯戡黎;五,微子——即序的誥,父師,少師。(11) 據鄭玄注尚書,則壁中古文裏還有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等篇。(12) 壁中古文原是些零辭斷簡,文字又難識,人都不能屬讀,所以,漢以後就都亡佚了。

在現存的七篇裏面,後面三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和微子,因為篇幅都不很長,時代較後,比較容易相信是真的。到

(11) 據此知查序所據的本子和今本不很同。

(12) 肆命一本作伊陟。

了盤庚三篇懷疑的人就多了。到了湯誓相信的人更少。

我以爲大部分古書總是經過許多變動的，這種變動常常是無意的錯誤，而不是有心的作僞。例如：

- (一) 因古文字難認而錯誤 像“文王”變成“寧王”，“玲瑩”變爲“玲瑩”。
- (二) 因傳寫而致的錯誤 像“己亥”的寫做“三豕”，“孝在位”的寫做“由乃在位”。
- (三) 因臆改而錯誤 像“腹腎腸”的爲“優賢揚”，下二字是經過改讀的。
- (四) 因爲口授的關係而聽錯的 像“惟口起羞”的變成“惟口出好”。
- (五) 因口授的關係，由方音而變化的 像“非台小子”的“台”，本當作“我”。
- (六) 因受後世語法或文法的影響而加字 像“取亂侮亡”，變爲“亡者侮之，亂者取之”。又像盤庚裏的許多“之”字，本來不一定有，“若顓木有由藥”，“紹復先王大業”，在當時已可達意，但後人一定要嵌進一個“之”字去，才覺得順適。正和唐人寫書喜歡加“也”字一樣。
- (七) 因錯簡而錯誤 像書序的疑至臣，本應作伊陟臣，在咸又伊陟原命一起而錯在夏社下。疑至兩字乃伊陟的聲誤。(13)

此外，也許還有基於別種原因的錯誤。凡一篇文章流傳的時

(13) 君奭說：“若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可證。楚辭引鄭玄注咸有一條云：“伊陟，臣曰”，似鄭所據壁中本不誤。

代愈久，地域愈廣，這種錯誤就愈多，有時和原來大相徑庭，但這只是錯誤，我們不能說成是“僞”。

盤庚裏面儘管經過若干變動，或者有若干地方和原本有出入，但我們沒有理由可說牠是後人所僞作的。盤庚裏的史實，大致是可信的。文章的格式方面，只是簡短的記事和演說辭，和商末周初的文相近。雖說文章較長，——以上篇最長，有五百七十多字，<sup>(14)</sup>但從那時到周初，據紀年說只二百七十三年，周初既有許多極長的文章，在二三百年前有此，並不足奇。本來記言記事，和詩論差不多，在文學裏同是很原始的，事有多寡，言有繁簡，多就多記，少就少記，所以這種文章的長短，和技巧無關，不妨先有像盤庚的長文，而後有高宗彤日一類的短文。

近代學者對於已亡佚的書不很注意，其實，佚書在歷史上或文學史上却是佔有重要地位的。我們只見湯誓以後，隔了多少時才有三篇盤庚，而盤庚以後，只有些短文，一直到周初，才有長文，這種現象是可怪的。但我們應知道做書序的時候，尚書裏所收的商書原有四十篇之多。這四十篇裏，<sup>(15)</sup>大約有十二篇是作於湯時，六篇作於太甲時，一篇作於沃丁時，八篇作於大戊時，一篇作於仲丁時，一篇作於河亶甲時，一篇作於祖乙時，三篇作於盤庚時，五篇作於武丁時，二篇作於紂時，時代本都啣接。在盤庚以前，還有太甲的三篇，咸乂的四篇，盤庚以後，也還有說命的三篇，那末，盤庚有三篇，不能說是篇幅獨長了。

在普通歷史方面，一定注意到這部分佚書，像“仲丁遷于囂”一類的話，商代的史事，才可以比較完備。在文學史方

(14) 但盤庚上似是兩篇演說所組成。

(15) 所附篇數，佚舊說，確否不可定。

面,也一定要注意到牠,才能得到商代文學史上的連鎖。比如說命三篇雖已亡了,但並沒有完全亡去。楚語白公子張說。

昔殷武丁能辨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旁求四方之賢,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厲;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曰“必交修,無余棄”也。

所引的書,大概都出於說命,而且是說命裏面很精彩的一部分。

在商末周初的文章裏,我們常看見一種譬喻的句子,像:

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微子

若涉淵水,予唯往,求朕攸濟。——大誥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同上

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諷。——同上

若稽田,既勤敷舊,惟其陳修爲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梓材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君奭

這種句法和上面所引說命的“若金,用女作厲;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及“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



祇足用傷”的句法，差不狠遠。

這種句法，不是說命裏才有的。盤庚說：

若顛木之有由藥。

予若觀火。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謂邇，其猶可撲滅。

若射之有志。

若乘舟，女勿濟，臬厥載。

顯然就是說命所據的藍本。

然而盤庚裏也何嘗是獨創的。禮記·緇衣引太甲說：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這是商初的文章，比盤庚大概又得早上二百年了。

人類一切的進化是遲鈍的，——尤其是在古代，他們創造的能力，還不狠豐富，所以這種句法，轉輾摹仿了幾百年，大概從商初到周初，是應有的現象。（以文字來說，從西周到春秋，用了五六百年，還沒有劇烈的變動，是一個狠好的例子）。這種文章本來大都是對話或演說，所以常有豐富的取譬。這種取譬，大都是日常習見的事情，聽者最容易領悟，所以常成為原始文學裏最精采的一部分。

除了譬喻以外，在古代文學裏最重要的部分，要算格言了。在商書裏面，格言極多，例如：

取亂侮亡。——仲虺之誥 (16)

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太甲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同上

(16) 或引作“亡者侮之亂者取之”。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盤庚

念終始典于學。——說命

學學半。——同上

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同上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簡，惟干戈省厥躬。

——同上

格言都是本人生的經驗而來的，是人生哲學的萌芽。所以，到了周易裏就有損和益，否和泰，剝和復，既濟和未濟等相對的概念，可以明白思想是漸進的。有些人懷疑這種格言，以為商代還不能有，但據我們看來，假如商人還沒有這一類東西，而周初突然發生，那才是怪事哩。

在商書裏，記事的部分是很少且很簡單的，大部分都是說話。但這種說話因時代較遠的緣故，很多是不能懂的。（商代文字，有許多是周人不認識的，所以，周人讀商書已未必全懂，至少讀起來不像秦檜順口）。但是，譬喻和格言，是沒有時代性的。在一個句子裏，即使有難識的字，也不難意會，所以，只有這一部分，常在周以後的古書裏引到。

造偽古文尚書的人，利用這部分材料，所以不去造孔壁尚存的典寶、肆命，而去造久已亡的太甲、說命。我們也應該利用這一部分的材料，才能得到文學史上的連鎖。只有把現存的和已佚的兩部分商書合併起來，才可以看見前後相承的痕跡，可以斷定牠們不是偽書，並且可以說商書是商代文學的代表。

但在這裏，又有兩個問題：一，商代何以不見韻文呢？二，文學的起源到底在什麼時候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以為商代是有韻文的。湯誓說：“時

日害喪，予及汝皆亡，’喪亡是韻。說命說：“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裘在筭；惟干戈省厥躬”；“兵”字據墨子尚同中所引當作“戎”。(17)戎躬是韻。墨子非樂引湯之官刑說：“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18)宮風是韻。又明史篇引商書說：

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惟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

若能共允，惟天下之合，下土之保。

蟲，方，心，寧，都是韻，似乎全篇本是韻文。這一類的材料，可惜流傳得不多。但我們已可以證明周易的用韻，孟子和墨子所引太誓的用韻，和有些周初詩篇，——像七月之類的用韻，都不是突然發生了。

說到文學起源的問題，我們可先把虞夏書檢討一下。這部分的材料，在書序裏據說包含了二十篇，計有堯典，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堯沃，大禹，皋陶謨，皋稷，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共十二個題目。孔壁古文還有舜典，汨作，九共，大禹，皋稷，五子之歌，胤征，等篇。現存的今文只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四篇。

誠如郭沫若氏所說，今文尚書二十八篇是害了大頭症的。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太大而無當，從各方面看來，都可以證明是商周以後的作品。雖則其間還包含了一部分的古代傳說。今文以外的佚書像舜典，汨作，九共，皋稷，大禹，皋稷等篇，所說也都是虞夏間的事情，據書序和古書所引佚文看來，和堯典等篇

(17) 墨子引衛命：“惟口出好，與戎”，孫貽讓說衛命即說命甚是。

“惟口出好”，出好即起羞。“與戎”即“起兵”，但脫“惟甲冑”三字。

(18) 這是百篇尚書所沒有收的佚書。左傳昭六年：“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即此。

性質差不多,大概也是後人補作的,這裏且存而不論。

甘誓是極簡單的一篇文章,并且不像堯典禹貢之類的編者,有滿腹經綸,而只是寥寥數言的演說辭,不像是後人所做的。(19) 據書序,這是啓做的。據墨子明鬼,却是禹做的。呂覽先己又說是夏后相的事情。(20) 郭沫若因為商的先世,也有伐有扈,因而疑心是上甲微做的,而把牠也改入商書,但如果真是上甲微做的,也還應列為夏書。

大概這是一篇商以前無主的古文,究竟是誰做的,周人已不很明白,因此也可以知道決不是後人所偽託的。

書序在甘誓下還有五子之歌和胤征兩篇,胤征今無可考,據書序作於仲康時,所以次在五子之歌的後面。(21) 關於五子之歌,書序說:“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這一件事,在古書裏的記載很多,像周書冢麥解說:

其在殷(當作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與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

離騷說:

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這都和書序相合。但是“子之”二字,恐怕是後加的。沒有收入

(19) 甘誓裏牽涉到五行三正的問題,但解釋或許不同,例如三正可讀作三政。

(20) 一本作夏后桀,或說是桀,或說是桀啓。

(21) 鄭玄注禹貢引胤征:“厥匪玄賞,昭我周王”,據孟子應該在周書裏,壁中書這篇恐怕多錯簡。選十六篇所以不能行,選大概是主要的原因。

尚書的時候大概只作五歌，聲變就成五觀，後人誤以爲人名，或逕作觀，以爲國名。像楚語說：

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

左傳昭元年說：

夏有觀，商有姚舜，周有徐奄。

墨子非樂又變成武觀，但仍是書的篇名，可見“觀”字是由“歌”字轉變過來的。五子本有五人，所以儘管變成了五觀，而漢書古今人表大康下說：“啟子兄弟五人，號五觀”。潛夫論也說：“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泗，是謂五觀”。還都以爲五人的號是五觀，本是很清楚的。僞本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始誤以武觀爲一人的名，又合墨子及周書來附會古本紀年啓征西河一事，以前學者多誤信爲真記年。於是五觀是一個人呢，五個人呢？這問題就鬧不清。武觀和五子之歌是不是一事，也沒法判斷了。

段玉裁因武觀就是五子之歌，就附會成五子到觀地去，魏默深又改做五子之過，這都可以不必的。無論觀地不在洛泗，把“之”字解爲“往”，在尚書同樣句法的目錄裏，却沒有這一個例。段氏以爲尚書裏不應以詩歌名篇，也不對。皇陶讀後面是收了三個歌的，尚書裏既可收歌，爲什麼不可把歌名篇呢？詩經所收，只限于周時，假使尚書不能收歌，這首古歌就無家可歸了。

墨子引武觀說：

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疑鎗鎗二字之誤）堯（當作桀）好以力。湛濁于酒，淪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乃弗式。

食,力,翼,式,都是韻。由這段佚文看來,似乎不是抒情的歌,而只是一種記事詩的體裁。

左傳哀四年引夏書說: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唐,常,方,行,綱,亡,都是韻。注左傳的各家都以爲指夏桀,但這是不對的。因爲如果是夏桀亡了以後做的,便應叫做商書了。僞古文把這一段稍加改動,收入五子之歌,却頗有眼光。太康失邦以後,據書序說“須于洛汭”,古本紀年說太康住在斟鄩,后相即位時住在商邱,後來住在斟灌,可見那時已離開冀方。所以,這一段佚名的夏書,很可疑爲五子之歌的一部分。也許這就是五子所歌的話,後來因此就把全詩叫做五子之歌。

關於五子之歌的記載和佚文,所能知道的,只有這些了,現在讓我們來看這篇書背後的故事。

在上文所論到的,當夏以前,約兩三百年,就有了國家了。但照古來的傳說,古代文化,在夏初有很大的變革。在氏族制度方面,炎帝黃帝本是兄弟,而一姓姜,一姓姬,少昊和顓頊顯然是兩個民族,但山海經有“少昊帝顓頊”,堯大概當讀做乳;舜據說是黃帝後,却是姚姓,後來娶堯二女,釐降妣酒,就改姓姬,禹也說是黃帝後,但又是姒姓;這些似乎都可以證明還沒有超出母系社會,所以堯可以不傳給丹朱而傳給舜。在器物方面,雖已有了銅兵,普通銅器還沒有發達,大概只是由金石並用時代剛進到銅器時代。在文化方面,大概還沒有歷史的記載。到了夏以後就大不同了,禹傳位給啟,是由母系中心而轉變到父系中心,於是就有了世襲的王朝了。洪水退了以後,因治水時

的經驗知道金屬的產地，便促進了銅器的發展，成為正式的青銅器時代。同時，因洪水後新恢復的繁華，加以政治社會工具等的新刺激，一切文化都向前發展，便產生了歷史。

夏后啟是開創這個新時代的主角，所以儘管有人罵他康娛淫縱，却依舊是禹的賢子。當那個時候，除了有苗或有扈以外，沒有什麼外患；雖然還有一個有窮后羿在旁窺伺，也未曾覺察，所以他便淫縱起來了。淫縱的故事是這樣的。

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當作成）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磬，右手操環佩玉璫。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海外西經

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開焉始得歌九招。——大荒西經

啟登后九年，舞九韶。——路史後紀十三注及大荒西經注引紀年

啟棘賓商（當作天）九辨九歌。——天問

把這種記載和上邊所引武觀和離騷對照，就知道所謂淫縱，只是舞九招的一樁事情。

九韶的樂，有人說是舜作的，有人說是禹興的，也有人說做帝嚳時就有的，這且不管，但舞九韶於野，大概是啟創始的。九韶的名稱，是因九成來的，所以淮南齊俗訓說：“夏后氏共樂夏籥九成”。成是奏樂一遍，遍通作辯，所以又叫九辯。（後世舞曲的遍，即由此出）又作九變。（見周禮大司樂）也可以叫做九奏。（史記趙世家：“廣樂九奏萬舞”。）九韶的樂器在答蘇謨裏記得雖多，但是堂上樂，也許還有後來增入的。大概牠的主要樂器是管和磬，所以武觀說“管磬以力”。（答蘇謨說“籥韶”，淮南子說

“夏籥”，籥籥都是管）。

武觀裏只說“萬舞”，萬舞和舞九招是一件事情。萬舞是舉着兩手學鍋子式的跳舞。<sup>(22)</sup>舞的時候，據海內西經的描寫——舞者赤裸着身體，只在腰以下掛着玉璫，舞時可聽見琤琮的玉聲，左手執着鳥羽做的翳，右手拿一個環。這種相類的舞底姿勢，我們在現代許多別的民族裏，還可以看到。

舞的時候還有歌，所以說“九辨九歌”。不過這種歌總是很簡短的，而且總是有唱有和的，所以我疑心谷絲謨裏所收入的歌就是九歌。因為九歌的名，由九辨而起，所以不一定是九篇。那個歌是：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歌辭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和辭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谷絲謨在“蕭韶九成”後，說到：“帝庸作歌”，可見這歌正是配九成或九辨的韶樂用的。左傳文五年引夏書說：“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墮”，九歌可以做勸戒，和這個歌辭的意思正相合。

但含有教訓意義的九歌，在殷時只用為娛樂了。當他在這曠野裏快樂地宴享，而且舉行空前的大規模的歌舞的時候，這種偉大的藝術，激動了當時的羣衆，引起各種的議論。有的人看慣前人的勤苦，就說這是太放縱了。有的人以為這樣新奇的玩意，一定是從天上得來的。

若干年後，殷死了，國家的威權也中落了。他的兒子太康中康等很平庸。他們建都的地方，給有窮氏奪了去，不得已而

(22) 這是葉世昌先生提醒我的。舊說萬是舞的總名。



逃出來，他的子姪輩五人在洛汭等待的時候，就做了一首歌就是五子之歌。照後人看來，總是啟的奢縱過分，給天知道了，上帝生氣，才有這樣的事情。

從啟的舞九招起，太康失國，寒浞殺羿，澆滅斟灌和斟鄩滅夏，后相，少康妻二姚，靡伐豷，女艾諜澆，一直到少康歸夏，這是多麼長，多麼有聲有色的一個故事。五子之歌不過是這個故事裏的一個序幕罷了。我疑心這個故事，原先本是一篇或幾篇極長的史詩，左傳襄四年魏絳引夏訓“有窮后羿”一句，下面就講從羿到少康的故事，夏訓恐怕就是這類史詩的一部分，魏絳因牠太長，所以引了一句後，只揀節目去說。除去魏絳所引外，左傳和離騷天問等還很多記載，假如沒有史詩流傳下來，是不會知道這樣詳細的。

那末，文學在商以前，包含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簡短的演說辭，例如甘誓，——胤征恐怕差不多。(23) 一部分由歌謠而變成史詩。歌謠的起源，大概遠在夏前韻文先於散文的定律，是同樣能適用於中國的。孟子裏引的一首夏謠確否尚不能定，——但我們至少可以說九歌是在啓時已有的，啓死後又有五子之歌，後來變為史詩。這兩部分的時期雖難確定，但總是商前流傳下來的東西，是可以無疑問的。

夏代是文學剛在萌芽的時候，到商代，日漸發展，周初尤其輝耀，到春秋以後，却漸漸微弱下去。這一千多年的古代文學，和整個青銅器時代，世襲王朝，都是不能分離的。到了春秋末年，老子，孔子，墨子等一班處士出來，文學史上就起了劇烈的變

(23) 墨子愛愛引夏謠，是我有苗用的，和這類相近。至於別的書裏所引夏的書，很多是後人偽託的。

動,另一新時期於是開始了。

### 三 銘識的起源和卜辭時代的銘識

許多學者崇信實物而輕略記載,但是地下實物的發現往往不如人意。周以前大批的文獻是寫在竹帛上的,但古竹簡的發現,在六朝以前,我們都看不見了。最近汲縣聽說又發見竹簡,可是看不清文字了。三代的帛書從未出土過。我們想望中的東西,總不能見到,而意想不到的卜辭,却突如其來地發現了。

地下材料的發現常常是偶然的,有出乎意外的新發現,可也有出乎意外的不發現,假如因為沒有發現而斷定那時代一定沒有這東西,那是很危險的。因為古物而沉埋在地下的,本只是一部分,而這一部分,不一定能發現;即使發現,未必能保存;即使保存,我們也未必看見;即使看見了,也未必能懂得。我們能看見而且懂得的,實在太有限了,所以只能考其已有的現象,而不要輕率地下結論,說某物或某種現象是那時所沒有的。

就現在已發現的屬於商代的地下材料說,除卜辭以外,只有銅器銘辭,材料較多。但無論在何種材料裏,都還沒有長過百字的文章。在前面,我根據記載,認為商代一定有很長的文章,但地下實物是不夠證明的。在這一方面只有寄希望於將來的發現了。但從別一方面說,單是文章的長短,卻不夠做文學進步與否的標準的。

器物銘識的起源,在什麼時候,現在還不很明瞭。據傳說,這種銘文是很早就有的。蔡邕銘論說:“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彝鼎有“丕顯”之銘”文心雕龍銘箴:“昔帝軒刻與几以弼違,大禹勒筭簋而招諫”。所謂黃帝

的巾儿和帝軒的與儿,大概都是本於漢書藝文志的黃帝銘六篇,其中有三篇是巾,儿和與,但黃帝書大概都是春秋後人偽作的。禹勒筭簋的故事,見今本鬻子,更靠不住了。孔甲盤孟見漢書田蚡傳和藝文志,班固說:“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這二十多篇的內容,現在不知道,恐怕也不很古。殷湯勒“甘誓”的話,很奇怪,皮錫瑞附會爲先有甘誓,殷湯勒銘其實“甘誓”兩字,只是“日新”之誤,“日新”和下句“丕顯”相對。就是大學裏所引的湯之盤銘。至於夔鼎見左傳,大概是周以後的銅器了。

古代的銘識,不單在銅器上。在安特生所發見的仰韶期陶器裏,我曾指出有幾個畫在上面的圖形文字,這種文字,大概遠在商以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陽發掘出來的陶器上,有刻的文字。這種刻文字在陶器上的習慣,在周以後盛行,面用朱砂寫在陶器上,漢以後也習見。而且在近代所見的實物裏,陶器以外玉石器,骨器等,也常有銘識。

在文字發生以後,使用的器物上,就可以塗寫或刻劃上幾個文字;在文學發生以後,就也可以在那上面做一篇銘文。所以玉石,陶,骨,木等器的有銘識,實遠在銅器銘識之前。大學裏引湯之盤銘,我們雖沒有積極的證明,但這種格言式的銘辭,在那時,確是可能的。(24) 在商初的時候,食器之類,許已有銅製,而樂杆恐怕還只是木製。在木器上面寫字,或刻字,比銅器裏的銘識,需要進步的工藝的,當然要容易得多。樂杆容積較大,不妨寫上很多的字,而且是日用的器,所以,要寫上一篇格言的時候,這是最適宜的地方了。

早期的銅器銘識,完全是範鑄的而不是隨便的塗寫和刻

(24) 可參攷余所撰頤齋吉金圖錄序。

劃所以比較是很後起的。最初的銅器,大概都是飲食器,是從匋器變來的;——冶金術就是從製匋術發展出來的,——銅器的形製和花紋都是摹仿匋器的;在那時,大概還沒有銘識。後來,范鑄的技術逐漸進步,就發明了銘識的範。這種銘識最初不過一兩字,有的記明自己的族徽,有的記載器所屬的祖父的稱號。大概商中葉以後才漸漸發展起來,銘長的可以到三十字,但所載的還不過是作器的原由,一直到周以後,才有極長的銘識。

已發見的商代銅器,拿量來說,真是不少,但有較長銘文的,却不很多,現在把較重要的抄錄如下:

丙寅,子易錫口貝,用作文獻己賓彝。才在十月又三,播。——薛氏鐘鼎款識十二文口己匚。

乙亥,子易錫小子甶王商賈貝,才在父。——續殷文存上廿五小子甶鼎

丙申,王易錫荷亞鑿奚貝,才在鑿。用作父癸彝。——殷文存下廿三荷亞角

酉。辛巳,王易鑿八貝一具,用作父巳。——續殷文存上八六,鑿

乙未,卿事易錫小子甶貝二百,用作父丁。——續殷文存上四八小子甶

甲寅,子商賈小子貨貝五朋,用作父丁。——續殷文存上八六小子貨

丁巳,王易錫佳貝,才在口,用作父癸。才在九月,佳唯王九祀,癸日。——薛氏款識卷三佳

癸巳,王易錫小臣邑貝十朋,用作母癸。佳唯

王六祀，彤日，才三月。覲亞。——續殷文存下六六  
小臣邑 畢

王易錫小臣錫易錫才在帝，用作且祖乙。——續殷文存上八六小臣錫 卣

癸巳，口商賈小子口貝十朋，才在口口，佳唯口令伐尸  
方。肇用作父丁。才在十月三。——續殷文存上四九小子口斂

丁巳，王省夔且，王易錫小臣夔貝。佳唯王來正  
征尸方。佳唯王十祀又五，彤日。——殷文存上廿  
六小臣夔 尊

乙巳，子令小子匚先目尸于董，親子光商賈匚貝二朋。  
子曰貝佳唯丁蔑女曆。匚用作母辛。才在十月，  
佳唯子曰令匚方。——續殷文存上八六小子匚  
卣

庚申，王才在東，王各幸榑，易貝五朋，用作父丁。  
才在六月，佳唯王廿祀又五。——殷文存下  
廿三幸榑 角

乙亥，王口才夔，王鄉西，尹夔，佳唯各商賈貝。用  
作父丁。佳唯王正征井方。——續殷文存  
上廿五尹夔 鼎

王來獸狩自豆，才在夔，王鄉西，王委幸甫貝五朋，  
用作寶簋。——續殷文存上四八幸甫 簋

辛巳，王會多亞豎，豎易錫貝二朋，用作太子丁口。  
——續殷文存四八豎 斂

覲亞。丁卯，王令子遄西方于舊，佳唯反，王賁伐甫

貝二朋，用乍作父乙鬯。——殷文存上八組子鼎

己酉，成咎辟于雷，泰辟九律，齊商賈貝朋，万夜用雷丁宗彝。才在九月，佳唯王十祀，癸日五，佳唯來東。

——薛氏款識卷二齊彝

戊辰，弼師易錫鬯，喜尙，釐發貝，用乍作父乙寶彝。才十月一，佳唯王廿祀，癸日，遯于匕戊武乙爽，蒙一。斂——殷文存上十九釐彝

乙酉，商貝。王曰：“市口易工，毋不戒”。遯于武乙之形日，佳唯王六祀。三日，湯後口商賈豐，用乍作父丁豐彝。市子。——薛氏款識卷二豐彝

辛亥，王才在廐，降令曰：“歸福于我多高望，易錫鬯”發用乍作毓且祖丁彝。辟師。——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上三四毓且丁尊

佳十月又一月，丁亥，我乍作酈鼎，且祖乙匕，且祖乙，且祖己，匕姓癸，征利繫，二女咸眾，永遯遺，禱二，舉貝五朋，用乍，父己寶彝。——續殷文存上廿六酈鼎

以上共廿二個銘辭，可以做最長的商代銅器銘識的代表。

除銅器外，安陽出土的小玉器刻有

乙亥，王易錫小臣龔，才在大室

十一字，雖寥寥短文，但和銅器銘識極近。

在殷契佚存裏，還有三個竹製的匕，(25) 有兩個同銘的，說：

(25) 竊不知是何器，郭沫若以爲兒戲非。此同銘的二器和羅振玉殷虛古書圖錄所說的殘疏匕正同。此器下端鐫下作七形，正應說絕佳的證據。又一嵌綠松石的，與羅氏所謂柶形同。馬衡氏說，七柶實一物。

壬午，王田于麥𦉰 麥 𦉰 商 斃 象，王易錫 宰 豐 常 小  
 指 (26) 兄，才在五月，佳唯王六祀，多日。

另外一個背嵌綠松石的匕，銘說：

辛巳，王則武口……麥𦉰 𦉰 商 斃 象。丁酉……

這種銘文和銅器也差不多。

有一個例外，是中央研究院發掘出來的三個獸頭骨，上面刻着

……于𦉰麥 麥 𦉰 商 斃 象，于……才在二月，佳唯王

十祀，多日，王來正征孟方口……

己亥，王田于𦉰……才在九月，佳唯王十……

戊戌，王𦉰田，……文武丁……王來正征……

三個刻辭。這並不是器用，只是商王在田獵後，矜伐他所獲的野獸，因而刻這短文在獸頭上而收藏起來的。

在這許多商代的遺文裏，幾乎完全是紀事的短章，而且大多記因事所受的賞錫，因而作器，在這種一套板的文章裏是很少文學意味的。

但我們要知道，器用是為實用的，普通的長篇文字，自有玉、石、竹、帛的簡書去記載，不能求之於銘識。格言式的銘雖然可以在器用上寫，但喜歡寫格言的人，在一個時期裏不是很多的——周代可考的只有大戴記等所引武王各銘，左傳所引的正考父鼎，考工記所引黼銘，——是偶然的，不是普通的，本來的數量就少，所以不容易發見。並且在商代，銅器的銘識還沒有發展到勒格言的程度，而其他的器物，在目前發見的太少了，所以

(26) 指字，大旁像矢，古大矢字多亂。此當即否字，見博倉及殷虛。在此疑借為七字。

更不容易有了。

商代的銘識，是不足以代表商代文學的。但是我們在這種銘識裏面，也未嘗不能找到一些有趣的材料，如豐彝說“市口易工，毋不戒”；毓且丁尊說“降令曰：歸福于我多高，祭，易錫鬯”却已把那時代的文學背景無形洩漏出來，雖然，這種材料，是太少了。

## 四 卜辭文學

### 甲 卜辭的起源

關於卜辭本身的史料，在記載裏幾無可考，因為當牠沒有發現以前，沒有人知道過，三千年前還有這樣一部檔案。

卜的起源，文獻也很缺乏。現在的商書裏從盤庚以下，常常講到龜卜，可以證明商人由盤庚時已尙卜。但據傳說，卜的起源，還不始於商。左傳哀十九年引夏書：“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墨子耕柱說夏后啓鑄鼎的時候，“卜於目若之龜，”像在夏時已有了龜卜。藝典和各繇謨雖後人所輯，却沒有龜卜的痕跡。(27)

用骨來卜，據初學記引楊方五經鉤沈說：“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中央研究院山東城子崖的發掘，在黑陶文化裏，發見了許多卜骨。那末，商代的衆用骨卜，似乎是從東方民族的習慣來的。

卜後刻辭的起源，大概是極遲的。李濟氏說：甲骨遺留下來的，以無文字記載者爲多，有文字者不過十分之一。”（安陽

(27) 禹貢說：“九江納錫大龜”，禹貢成書或較藝典等更遲。錫疑即蜥蜴，納蜥蜴與大龜，也似不爲卜用。



發掘報告五七五葉)這種現象,固然也可以解釋做卜後不一定要刻辭。但刻辭制度既行以後,大體總該刻的多,不刻的少。殷墟發現未刻辭的骨,如此其多,只能解釋做刻辭制度未行前所遺留下來的,那末,刻辭制度的晚起是無疑的。

董作賓氏的甲骨文斷代研究裏把卜辭分做五期,而把第一期假定在高宗時,我想是遲了一些。據我所知道的,武丁時的卜人,像戠完等至少還有一班老前輩,像邑中等人,或許是盤庚小辛小乙時的卜人。但刻辭的起源離此總不十分遠。

卜了之後,為什麼要刻辭呢?這是大家所願意知道的。我以爲不外乎下面兩種理由:(一)卜人們自己記下他們的經驗,(二)他們的主人要考驗他們的成績。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注：“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可見把命龜之事和卜兆記下來是與考驗成績有關,不過,周人不逕寫在甲骨上而別有帛書,和殷人不同。

商代的卜,本來不必記辭,日子久了,覺得有記下來的必要,而甲骨上又有許多空隙,所以逕在甲骨上刻辭,這是最簡捷的,和錫記在匕上,獲豕記在獸頭上一樣。周以後只用龜而不用骨,大龜又日漸稀少而變成寶物,於是卜辭另寫在竹帛上了。刻辭於甲骨的習慣,古書裏沒有記載,於是老先生要疑心是後人偽造了。

#### 乙 卜辭的組成

殷墟所出甲骨刻辭,除了卜人們必須參攷的干支表,和他

們練習書法，或隨意刻畫外，全部都是卜辭。卜辭的組成，可分為敘事，命辭，占辭，占驗四部分。

卜辭的敘事，是在命辭占辭以外的。最簡單的是記卜兆的數目。後來漸漸擴展，就有記時，記人，記地，記事四類；可是，在每一辭裏，是不必全備的。很多卜辭，就只記一個日名。

卜辭的敘事，大都和命辭占辭摻合一起，但也有獨立的。

例如：

乙巳。丙午。——卜辭通纂四七四片

庚寅卜。——殷虛書契文字三四葉十一片

晉——同上四四葉十三片

癸卯卜，王。——同上五十葉八片

甲申卜，王。才夾卜。——殷契佚存七九二片

有的只寫日名，有的只寫卜人，也有兩項合寫的，也有更寫地名的。在這種型式裏，有時不記命辭和占辭，有時記在別處。

記時裏的日名，總是在全辭的最前，例如

乙未，貞大郛其蕃，勿日。——殷虛書契後編上二六葉六片

癸亥卜，貞王寧示癸，翌日，亡尤。——同上一葉九片  
日名下卜字的有無，是不一定的。

記月在早期的卜辭裏，多附在全辭的最後和本文稍遠，字體大小也不一致。有時在某月上，繫一才(在)字，例如：

癸口卜，旅，貞旬亡咎。才十一月。——龜甲獸骨文字一卷七葉八片

後期的卜辭裏，却往往把“才某月”變成卜辭的一部，在牠後面，也常有別的事情。

記年是晚期卜辭才有的。有時稱祀，例如“隹王九祀；”有時稱司，例如“王廿司”。都在記月的後面。

和命辭連在一起的卜人簽名的形式有三種：一種簽在最後，例如：

己未，俎于義京，羌三，卯十午。中。——殷虛書契六卷二葉三片

這種形式，似乎是早期所獨有的。一種在某日卜下面，例如：

庚午卜，翌，貞告于三父——龜甲獸骨文字一卷五葉  
庚子卜，行，曰：貞羽辛丑其又才，戡于且辛。——殷契佚存四〇一片

壬午卜，卜即，貞其漑。——卜辭通纂別二，七葉十三片

第一例最普通，第二例示卜人所言命辭，第三例的“卜即，”就是卜人而名即。還有一種，則在王或子親卜的，常寫在卜字上面而成為某日某卜。

記地的方式不一，有的在命辭後，例如：

貞旬亡田。才翌。——殷虛書契後編下三葉八片  
癸巳卜，貞王旬亡田。才二月。才齊師。隹王來正尸方。——殷虛書契二卷一五葉三片

甲寅卜，旅，貞今夕亡田。才二月。才自蔡卜。——同上六卷三四葉四片

庚午，貞龜大雩于帝五丰臣，且，才且乙宗卜。——劉晦之藏骨

有的記在命辭前，例如：

癸丑卜，才翌，貞王旬亡獸。甲寅，羽兔甲，才八月。——

殷虛書契菁華九葉二片

但如記卜人的話,又有下列三種形式:

癸巳卜,王才豐,貞旬亡田——殷虛書契後編上卷十葉九片

庚寅,王卜,才爻,貞余其貞才效上爻。……—殷虛書契二卷五葉三片

癸酉卜,才攸,永,貞王旬亡畎。王來正尸方。——同上二卷一六葉六片

記事都是因記時聯帶而及的,像“王來正尸方,”或“甲口,祭口甲……,”常在全辭的最後,和在辨銘裏差不多。

命辭是卜辭的主體,形式上較自由,但大體上也還都拘於格例。貞旬,貞夕貞雨,王寧,王弑,王田,一類的句法,都差不多。貞旬和貞夕,大都用“亡田”和“亡畎,”王寧大抵用“亡尤,”王弑和王田,總用“亡攸,”“亡攸,”或“亡攸”。

普通在起始的時候,用一個貞字,例如:

貞邠宙牛三百——殷虛書契四卷八葉四片

也有作貞曰的,例如:

貞曰氏來,乃里于臺。——同上四卷三五葉一片

但有很多命辭是不冠“貞”字的,例如:

生于且辛八南。——龜甲獸骨文字一卷十二葉七片

戊申,彙貞示二。底。——殷虛書契續編六卷九葉四片

以前,董作賓,郭沫若,和我,都以爲骨白刻辭是記事文,不是卜辭,因爲那是沒有卜貞二字的。其實是錯了,卜辭裏面,卜貞二字,

原來都是可寫可不寫的,前面所引“己未,俎于義京,羌三,卯十牛。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貞祭祀的辭。𠄎字是彳形的倒寫,只是豕形而無足,倣釋茅,董作賓釋矛,固誤,郭沫若釋包,也不對。

占辭都是很簡單的。有一部分的占兆,最先單獨寫在兆旁,可分為三類,如:

一告 二告 三告 小告  
不午 不午𠄎  
吉 大吉 弘吉

後來往往變成卜辭的一部分,例如:

癸酉卜,王,貞旬亡田。吉。告。——殷契佚存三八五片

帝𠄎貞不午。——鄴中片羽下四一葉三片  
至于“王𠄎曰:吉,”“王𠄎曰:大吉,”“王𠄎曰:弘吉”的轉為卜辭,寫在命辭後,更是極普通的。

“又田,”“又𠄎,”“出希,”“亡田,”“亡尤,”“亡𠄎,”“亡𠄎,”“利,”“不利”一類,都是占辭。有時在貞句辭後面,記一“寧”字,在王田辭後面記一“𠄎”(禽)字,也都是占辭。但假如用占辭去命卜的時候,就變成命辭了。

占驗是有記有不記的。像:

壬申卜,設,貞𠄎𠄎𠄎𠄎,丙子,𠄎,允𠄎二百出九”。——殷虛書契四卷四葉二片

壬子,王卜,貞田𠄎。𠄎來亡𠄎。王𠄎曰弘吉。效𠄎𠄎𠄎𠄎一,𠄎八,𠄎一。——同上二卷二七葉一片  
這種禽獲野獸的數目,都是占驗的追記。又在“王𠄎曰:

出希其出來禋，”之後，常常說“允出來禋，”以下也都是占驗。

以上四類，命辭和占驗的範圍較廣泛，形式也稍自由，但大體上看來，也還是很呆板的。所以，從卜辭的構造剖析起來，形式的束縛太多，在文學一方面是無法發展的。

### 丙 卜辭文學的研究

卜辭的本身，本和銘識一樣，不能代表商代的文學。牠只是屬於太卜的龜室裏面的一大批陳年斷爛檔案，除了等因奉此以外，所餘都不過幾個字，所以，要在這裏面求偉大的文學作品，是不可能的。有些學者把這部分材料的價值看得太高，以為只有這種真是商代的文學，而紙上材料，是完全不足信的。他們只顧把卜辭抬高，却把商代整個文化壓抑的太低了。

自然，在文學史上，卜辭還要佔很重要地位的。傳世的商代文字，只有商書、商書雖足以代表商代文學，但傳寫多誤，很多是不能懂的，不如卜辭還能看出商代文章的真面目。其次商代的銘識，材料既遠不如卜辭的多，也不能像卜辭這樣和文學有關。周以後的銘識有偉大的文學作品，但在一般文化方面，也不像卜辭所包含的廣泛。所以，研究古代文學，在目前，卜辭實在是很重要的材料。

卜辭裏雖然沒有很長的篇幅，但實有很好的斷句，這是前人所沒有注意到的。不過，這種句子是很難找的。第一要點是不可殘缺過多，不能句讀。第二，不可有不能認識的字，（偶有一二，必無礙文義）。尤其不可有認識錯誤的字。所以，在幾萬斷片中，我只選出六十餘條來做代表。（每辭只截取較精粹的斷句，其餘不錄。卜貞等字亦均節去，因為這樣才可脫離形式上的拘束）。如下：

“自師母才在魏延。——殷虛書契一卷九葉

“余弗其子韋姪子”。——同上一卷二五葉三片

“累來養”。——二卷十一葉一片

“王其尋舟于河”。——同上二卷二六葉二片

“今三月帝命令多雨”。——同上三卷十八葉五片

“反魏二月中有大雨”。——同上三卷十九葉三

片

“今夕奏魏中有从雨”。——同上三卷二十葉四片

“帝其降璜”。——同上三卷二四葉四片

“王今夕寧”。——同上三卷二五葉四片

“其佳唯今九祀，正征戎”。——同上三卷二八葉三片

“禾中有及雨”。——同上三卷二九葉三片

“又有豚才在行，其少左疾”。——同上三卷三一

葉一片

“韋姪出有子”。——同上三卷三三葉八片

“葛勿憂無韋姪子子”。——同上四卷一葉六片

“余其耕作邑”。——同上四卷十葉七片

“我家舊駱臣亡巷我”。——同上四卷十五葉四片

“王于正征，辟闢門，來”。——同上四卷十五葉七

片

“其于西宗奏王”。——同上四卷十八葉一片

“距多鬼脫，亡疾”。——同上四卷十八葉二片

“乎呼 賈 賈 內，入第事”。——同上四卷二八葉

三片

“其用龜”。——同上四卷五四葉七片

“其酹酒多，彤弓勿鼓”。——同上五卷一葉一片

“平呼帝好先人于廬”。——同上五卷十二葉三片

“日若茲敏，隹唯年因”。——同上五卷十七葉五片

“今夕子亡不若”——同上五卷二十葉六片

“王初制令”。——同上五卷三九葉八片

“季希崇王”。——同上五卷四十葉五片

“茲霍風不隹唯饒”。——同上

“倭倭隹唯里有不足”。——同上六卷四葉一片

“隹唯我奚誤不足”。——同書六卷十九葉二片

“雷龜鳴翌日”。——同書七卷五葉二片

“雨不足，辰不隹唯年”。——同書七卷三十葉一片

“王大令衆人曰，瘠田，其受年”。——同書七卷三十葉二片又續編二卷二八葉五片

“帝冥施余子”。——同書八卷十二葉三片

“月一正曰食麥”。——殷虛書契後編下卷一葉五片

“寅彝不益，隹唯之又甯”。——同書下卷三葉十片

“今其雨，不隹唯霽”。——同書下卷七葉二片

“王犛首，亡征”。——同書下卷七葉十二片

“子翬翬駟三方”。——同書下卷八葉一片

“羽癸卯，王亦東萊出，出萊聚”。——同書下卷十三葉十四片



“其乍作亞宗”。——同書下卷二七葉一片

“亡降尹”。虎——龜甲獸骨文字二卷二一葉八片

“之日,王坐往于田,從東,允變機豕”。——同書二卷廿二葉十一片

“告龜秋于污”。河——殷契佚存五二五片

“王曰,出有身,劬。嘉 齊曰,劬。嘉——同書五八六片

“出兵,若”。——同書七二九片

“我曷勿涉于東兆”。洮——同書六四七片

“方來入邑,今夕弗歷震王自”。師——殷契卜辭八九片

“王將夢白牛,隹唯田”。告——簠室殷契徵文人名六片

“……旬,壬申夕,月出有食……”。——同書天象二片

“王涉滴,歟,又有鹿,罕”。禽——殷虛書契續編三卷四四葉三片

“立中,允亡害”。風——同書四卷四葉,五片

“恒其乍作效茲邑田”。告——同書四卷二八葉四片

“其禱登新國二升一直”。——同書一卷四十葉五片

“王剋復不安,亡祉”。延——同書五卷六葉一片

“其令多尹乍作王帝”。癸——同書六卷十七葉一片

“自今十年出有五,王豐……”。——同書一卷四四葉五片

“不其夬終夕雨”。——福氏所藏甲骨三二片

“其于一人田”。告——大龜四版之三

“若效茲不雨,帝隹唯效茲邑龍,龍不若”。——卜辭

## 通纂別錄二 中村獸骨

“帝 茲 浮 冥 琬 余 弗 其 子”。——鄭中片羽下四十葉五片

“出 有 帝 崇 茲 艱 亡 其 終 暫”。——北京大學藏骨

“自東 西 北 豎 逐 亡 其 亡 戎”。——劉晦之藏骨

“孚 于 三 方 其 五 大”。——明義士藏骨

“王其令命 豎 乘 帝 茲 其告于且 祖 乙 一牛”。——同上

“王于南門逆 差”。——同上

“余帝 茲 亡 祀”。——拓本

我們看這種斷句，文從字順，彷彿在看周易、詩或左傳，卻不像商周間的尙書。這是什麼原因呢？我以為尙書本來也是很好懂的，經過幾回的傳譯錯誤太多，就不好懂了。以卜辭出土後而論，研究牠的學者已學得了幾百年來古文字學的經驗，比之周朝人讀商書，漢朝人讀周書，總要高明得多。然而像“乎 胸及內”的“胸”，誤釋做“珍”，“告 龜于河”的“龜”，誤釋為“夏”之類，還觸目都是。尤其奇怪的，像“奏 舞，有从 雨”，讀成“拳 爽之从 雨”，“有祟 艱”讀成“之求 恆”就是尙書也不能獨美於前。由此可見尙書的艱澀，不足為奇。同時，也可見商代文學本來是很美麗的。

但是，卜辭受形式的束縛太甚，大都是照例的套語，這種較好的句子，是不容易碰到的。在幾萬斷片裏，較長和較完整的卜辭，不過十多條，現在抄下來，做一個比較如下：

“庚 寅，王卜，才癸，貞 余 其 隕，追才在茲 茲 上 癸 今 茲 秋 其 辜。其乎 呼 示于商 正，余 受 丕。祐 王固曰吉”。

——殷虛書契二卷五葉三片

“乙丑卜，貞才獸。天邑商公宮衣，效茲夕亡獸。咎寧。才在九月”。——同書二卷三葉八片四卷十葉五片合

“甲午，王卜，貞粹非余彫，酒朕奉酉。酒余步从医喜正征尸夷方，三緊示受授余冬。祐不曹戕，歲因告于大邑商，亡咎它自獸。王囑曰吉。才在九月，遯上甲。雀。佳唯十祀”。——同書四卷一八葉一片三卷二七葉六片合

“乙巳，王，貞啓乎呼兄祝曰，孟方火人其出伐中，自師高其令命東滄口，高弗每。不曹戕，歲王囑曰吉”。——龜甲獸骨文字二卷二五葉六片

“丁卯，王卜，貞今田，巫九侖，余其从多田，旬于多白，伯正征孟方，夷衣，羽翌日步，亡尸。自上下最示，余受冬。祐不曹戕。歲因告于茲茲大邑商，亡咎它才在獸。王囑曰弘吉。才在十月，遯大丁，羽”。——中央研究院藏骨

“口口卜，孚，貞彗，姁冥，詭幼。嘉王固曰：其佳唯庚冥，詭幼。嘉句辛丑，彗，姁冥，詭幼”。——殷虛書契續編四卷廿五葉一片殷契卜辭一八四片合

“己亥卜，底，貞羽翌庚子彫。酒王固曰：茲茲佳唯庚雨卜。之夕雨，庚子彫，三齊云鷗，其既執辰”。——殷契卜辭二片

“口口卜，孚，貞羽翌乙卯其俎，易臨日。乙卯，俎，允易臨日。吳，霍于西”。——鐵雲藏龜十三葉三片又六九葉一片又八五葉一片又百十葉一片合

“王固曰：出有帝，崇其出有來。三至九日辛卯，允出有來。自北，𠩺𠩺告曰：土方歸我田十人”。

——殷虛書契菁華二葉

“癸巳卜，貞，貞句亡田。告 王固曰：乃效茲亦出有帝，崇若僭。甲午，王往至，至聚，小臣由車馬戕，尹王車，子冥亦阨”。——同上三葉

“王固曰：出有帝。崇 八日庚戌出有各云自東賓母。吳亦出有出，自北，飲于污”。河 ——同上四葉

“癸卯卜，貞，貞句亡田。告甲辰，大受。風 之夕良。乙巳，口擊口五人。五月，才在口。——同上五葉

這種卜辭雖像很長，但除去照例的話外，至多也不能過二十字，在這種形式的束縛裏，就是大文學家也束手無術。

卜辭作者，不能放筆去寫，他們就盡量去捶鍊。他們用“品”字，是當祭祖宗的牲數高下講的，例如：

“其品司，才在茲” ——殷虛書契後組下卷九葉十三片

“乙未，彫。酒 綴系品，匱十，匱三，匱三，匱三，示三，示三，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采，三，……三，且乙十，……”——同上上卷八葉十四片 殷虛書契後組文字一葉十片 劉 晦 之 藏 骨 合

一個極大的祀典，只用“系品”兩字，真是簡無可簡了。在這種文章裏，而要略施狡猾，像常常說的“王曰吉”，忽然改做“王吉斯卜”，這真是難能可貴了。

雖然這樣說，卜辭裏有這許多優美的斷句，已經儘够替嘆了。這種句子，決然不是文學剛在萌芽的時代所能有的。一

個人在隧道裏過生活的時候，瞧見一線陽光，就可以斷定地面上正有絕大的光輝。我們從這許多精美的斷句，也可以斷定商代已有極燦爛的文學。

前面已說過，文學的高下，不以長短為標準。春秋法言，世說新語篇幅都很短，但我們不能說周和漢、晉沒有很高的文學。在卜辭裏所用字彙的豐富，文法的完密，顯然已和周以後相近。許多成語，像：“王賓”，“多日”，“告麥”，“有年”之類，都是後來所本的。又如：“備方”就是尚書裏的“陟方”，<sup>(28)</sup>“遄旅”就是詩經裏的“振旅”，“征釐”就是後世的“延釐”，卜辭裏喜歡用這種成語，可見在那時的文學的背後，已有很長的歷史了。

卜辭裏的“之”字還只用做形容字，像“之日”，“之夕”，詩經和“之子”相類，而沒有像普通的用法。但“哉”字確已應用了。有些累贅的句法，像“百日有七旬有口日”，（殷契佚存一二三片）和藝典的：“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正同。這種偶見的例子，雖可以證明商代的文法，有些不如周代的進步，但大體上却已很接近了。

關於卜辭的文學部分的各種專門的研究，尚未開始，所以現在能討論到的只有這些，這在我們研究卜辭的人是十分感覺到不滿足的。不過，在本文裏，只用以證明商代已極有高的文化和文學，這是較容易做到的，所以也無須十分地精密了。

## 五 結 論

由上文的論證，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

一 商代已是青銅器時代。氏族組織是父系家長

<sup>(28)</sup> 許多人誤讀為“循”，是錯誤的。集韻直同“陟”。

制度。在那時已有很高的文化,這種文化是從夏時開始的,而一直到周時還繼續着,商民族適當着極盛的時期。

二 在文學方面,也是一樣。夏是文學剛萌芽的時代,有許多史詩或短文遺留下來。商代到周初的文學,則非常燦爛。這種古代文體一直到春秋時才衰歇。

三 地下材料裏的銘識,尤其是銅器銘識,起源太遲,所以不能代表商代文學。但也有些句子,偶然反映出那時代是有很高的文學的。

四 卜辭是一部分檔案而不是純粹文學,所以也不能代表商代文學。牠有形式的拘束,所以在文學方面不能十分發展。但有許多極精美的句子,在文學史上佔極重要的地位。並且,可以證明商代的文學已十分發展,和周代相差不遠

許多流行的說法,總是把中國古代文化抑得太低。他們要把一切文化移後幾百年,所以周人或漢人的功績特別加大了。但是文化能突如地產生而成長嗎,在進化史的立場上,總說不通。

這種弊病,是由於對周以前的歷史文化認識不明而起的。因為不明,而去懷疑,本是應當,但只去懷疑,是不能有收穫的。

古代的記載,固然是不可盡信,大部分却不能不信。我們一定得先有標準才能去判別記載的真偽。所以研究古史,一定得由考古學和古文字學入手。

懷疑以後,一定要有所確信。我們不能儘說周以前沒有

什麼,我們應當去研究周以前有什麼。懷疑只是破壞的工作,有確信才能有建設,所以希望學者們大家來做後一種的工作,庶幾真正的中國古代史可以重新建設起來。

